

#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系,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 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 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 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 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 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 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 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关键词:** 汉代; 长安; 成都;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09)01-0006-06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 不仅是西部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城市, 而且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 长安与成都的经济文化互动, 不但支撑起了两汉王朝的政治大厦, 而且分别是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 通过千里蜀道实现二者的联系, 构成了一个声息相通的中华文明动力圈, 带动全国、辐射遥远的西部, 影响深远。

## 一、“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

秦汉时期的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共同拥有“天府之国”的桂冠, 长安与成都则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在秦汉人的意识中, 秦蜀两地不仅山水相连, 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一体化的。《史记·天官书》曰:“中国山川东北流, 其维首在陇、蜀, 尾没于勃、碣。”关陇与巴蜀地区是中国山水的龙首与龙脉之所在。《史记·货殖列传》则将关陇与巴蜀视为统一的大关中经济区,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 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为上田。”“及秦文、德、缪居雍, 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然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唯褒斜结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 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

穷险, 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在大关中经济区中, 巴蜀、陇右、秦川三足鼎立; 巴蜀与秦川最为富饶, 是天府之国的两大核心地带; 然巴蜀“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陇右“地亦穷险”, “唯京师要其道”, 京师长安才是关中经济区的核心和文化辐射源。这种以京师长安辐射西北、带动西南的经济、文化一体化格局, 是两汉时期中国西部文化高地发展的基本态势, 从而促进了成都文化的繁荣, 彻底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 使得四川盆地不仅以物产丰饶出名, 而且以文化上比肩中原自傲。

在两汉政治家的意识中, 天府之国的桂冠是由秦地与蜀地共享、长安与成都互动形成的。首先, 西汉的统一路径与秦朝不同。秦是由关中而蜀汉, 由北向南完成统一大业; 西汉则是由蜀汉而三秦, 由南向北完成统一大业。正所谓“秦之帝用雍州兴, 汉之兴自蜀汉。”<sup>[1] (P537)</sup> 刘邦与“汉初三杰”在制定统一战略时, 就是从巴蜀、关陇一体化的角度来设计的。《汉书·萧何传》: 项羽入关后, “屠烧咸阳, 与范增谋曰: ‘巴蜀道险, 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 ‘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 而三分关中地, 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 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 何谏之曰: ‘虽王汉中之恶, 不犹愈

收稿日期: 2008-09-20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07H009Z)

作者简介: 梁中效(1961-)男, 陕西汉中人,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教授。

于死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谄于一从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说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不仅萧何、韩信有连接秦蜀、统一天下的思想，张良也有同样的设计和行动。《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由此看来，完美的秦蜀一体，支撑西汉王朝完成了天下统一大业，所以《史记·酈生陆贾传》中，酈生认为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陆贾也认为“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其次，西汉建都长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有巴蜀之饶”。《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娄敬建议定都关中，刘邦左右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刘邦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认为洛阳虽然险固，但“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刘邦意决，西都关中。汉代的关中与蜀汉地区唇齿相依，在西汉王朝建立前后，“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sup>[2] (P28)</sup>在西汉王朝最为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开凿褒斜道，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加强蜀汉与关中的联系，将西南丰饶的物资转输关中。《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蜀地及成都市，“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由此看来，西汉王朝的巩固繁荣，是关中与蜀汉共同缔造的。再次，东汉虽然定都洛阳，但迁都长安的争论不绝于耳。加强长安与成都的互动是东汉安定西部的主要措施。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称帝，将河洛地区作为根据地，此时无暇顾及西部，直到建武六年（30），建武始“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sup>[3] (P47)</sup>此时关中面临严重的威胁，一是陇右隗嚣反，二是巴蜀公孙述屡北犯。建武八年（32），岑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刘秀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

蜀。”<sup>[3] (P47)</sup>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破公孙述于成都，平定巴蜀。建武十三年（37）夏四月，“益州传送公孙述誓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sup>[3] (P42)</sup>至此，关中与巴蜀进入了统一安定的时期。西汉长安文化的精华经过成都的保护与发展，被东汉王朝所继承。得陇望蜀之后，东汉王朝偃武修文，以柔道治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对家乡父老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sup>[3] (P47)</sup>大行柔道的转折点就是平定陇蜀之后，“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倣急，未尝复言军旅。”<sup>[3] (P58)</sup>从而促进了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总之，两汉时期的长安与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文化互动，不仅促进了汉王朝的巩固与繁荣，共同支撑起了两汉帝国的政治大厦，而且两大都会的文化互为补充，长安辐射带动了蜀地文化的繁荣，使其人才辈出，“文章冠天下”，成都则以其富饶，在中原动荡之时，保存了西汉长安文化的精华，延续了西汉文化的薪火。

## 二、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

辞赋，是汉代最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文学样式，它是从《楚辞》的“骚体”演化而来的。《汉书·扬雄传》称“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就是辞与赋的通称。汉赋在形式上更趋散文化、叙事化，而又讲求句式的排比、对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汉赋内容广阔宏大，全景式地展示了汉代文化的盛况，即“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归馀总乱。”<sup>[4] (P67)</sup>而汉代最伟大、最杰出的辞赋作者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他们都生长于蜀地成都，成名于秦地长安。

以成都为核心的蜀地是汉代辞赋作家的摇篮。《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杨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对西汉辞赋发展繁荣有贡献的八位大家中，蜀地就占了三位，而且是汉赋繁荣时期最负盛名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西方学者也认为汉武帝时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三位学者是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指出：“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汉武帝时期的突出

表现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约死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于其子司马迁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是范例。<sup>[5] (P185)</sup>而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先后对长安与成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蜀地的辞赋作家之所以蜚声文坛,慧泽后世,关键在于两汉时期长安与成都之间密切的文化互动。

西汉的巴蜀区域有着“兴王之地”的自豪感和走出盆地获取功名的成就感,朝廷也格外重视蜀地,长安与成都之间的千里蜀道上交通繁忙,人流如织,正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云:“蜀自汉兴至平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恩。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王帛戈戈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阁,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集,李仲元湛岳立,林公孺训诂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文中提到的司马相如、扬雄、严遵、王褒、李弘、林间、何武都是蜀郡成都人,只有王延世是犍为人,但也是由成都走向长安的,他在成帝河平年间治水有功。文中的杨壮,是成都人,在成帝时为郎,向成帝诵读扬雄的文章,扬雄因此成名。何显,是成都郫县人,官至颍川太守。杨得意是成都人,向武帝介绍司马相如。东汉时期,国都虽然在洛阳,但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丝毫没有减弱,《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亦云:“降及建武以后,爱乞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赵志伯三迁台衡,子柔兄弟相继元辅,司空张公宣融皇极,太常仲经为‘天下材英’,广陵太守张文纪号‘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特能决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张俊、秦宓英辨博通,董扶、杨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训徒,同风洙泗。”“自时厥后,龙宗有鳞,凤集有翼,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这段史料说明,东汉时期成都、蜀地也是人才济济,其中“常

茂尼流芳京尹”,是指常洽曾在东汉末年担任京兆尹。正是这种频繁的文化交流,才形成了蜀地、成都人文蔚盛、“文章冠天下”的局面。

“长卿彬彬,文为世矩”。<sup>[6] (P112)</sup>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他的一生正好在汉王朝最安定祥和和最繁荣富庶的社会环境里度过的,他那颇富浪漫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辞赋创作,不仅集中展现了巴蜀文化传统特征,而且也是繁荣昌盛的长安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他的成长成名是在成都与长安两大都市完成的。他少好读书、击剑,先在文翁创办的成都官学学习,后被推荐到长安学习五经。学成之后,捐资为郎,官拜武骑常侍,侍从景帝。由于景帝不喜辞赋,遂离开长安,在梁国(今河南商丘县东)度过了一段快意的宦游生活,写出了成名作《子虚赋》。这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将成都文化与长安对接。公元前143年,梁孝王去世,25岁的司马相如只好回到成都,闹出了“凤求凰”、“文君私奔”、“文君当垆”等一系列风流韵事,体现了蜀地文人的浪漫、叛逆和率真、豪放精神。公元前140年,武帝登基,“好大喜功”、颇尚文学的刘彻极为赞赏《子虚赋》发出了“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慨叹。当武帝惊讶地获悉司马相如就在成都,立即召司马相如进京。这次离开成都的司马相如更加自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sup>[6] (P227)</sup>后来此桥名驷马桥。汉代三公六卿才能乘坐驷马,进入长安后的司马相如,最终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这次由成都到长安,既是司马相如个人仕途生涯和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大转折;又是浪漫多情的成都文化与大气磅礴的长安文化的一次大交流,拉开了蜀地精英挺进长安的大幕;更是汉赋创作的一次大推进,激发了汉赋作者的创作热情,出现了汉代辞赋创作的高峰,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辞赋,既继承了成都巴蜀神话传说及南方文学传统,又吸收了长安多元文化的宏大气魄及北方儒家文学的时代精华,通过艰苦卓绝的创作实践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基调是浪漫主义的,以南方文学为本,但又扬弃了《楚辞》中那些巫祝、怪力乱神的成分,“云梦泽”、“上林苑”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它只不过加以集中、夸张而已;动机是现实主义的,以北方文学为用,吸收了帝京文化“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气度,但又扬弃了儒家文化对王权的过度依附性,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精神,即使在极端铺张的作品中,也多贯穿有所讽喻、有所针砭的主线。因此,明代王世贞说:“长卿之赋,武之圣者”。

鲁迅先生也说：“广博宏丽，卓绝汉代”。<sup>[7] (P51)</sup>是长安与成都联袂将司马相如推上了汉赋与汉代文化的圣坛。

司马相如之后，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但到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宣帝刘询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成帝刘骢精于《诗》《书》观古文，广求天下遗书。这些都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进一步促进了长安与成都文化的交流。继司马相如崛起文坛，以赋名世并影响后代的当推王褒（约前 88—约前 55 年）、扬雄（前 53—18 年）他们都是蜀地人。

王褒比司马相如晚出约半个世纪，是汉宣帝时代最有名的辞赋家，汉赋的又一代表作家。王褒的成才成名也是在成都和长安两大都市完成的。《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崇尚文学，颇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汉书·何武传》则云：“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由此可见，王褒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将成都与长安联系在一起，由成都走向长安，由成才走向成名。进入长安后，宣帝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以良御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抒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俾明主以显其德”。王褒随侍皇帝左右，所幸宫馆，辄令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后太子病重，帝令王褒赴太子宫，朝夕读奇文及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赋》。《洞箫赋》是王褒的代表作，也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将巴蜀文化的“盛有养生之饶”与长安文化的“蒙圣主之渥恩”相结合，<sup>[6] (P210)</sup>但整体风格更具南国文化的生命娱悦之意。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蛩玄猿，嬉娱悲吟，它们的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也融进了南方文化的特

殊氛围。正是对生命的这种吟唱，使太子得以康复，“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洞箫赋》是一篇典型的咏物小品，和司马相如时代的“劝百讽一”的大赋，内容上全然不同。王褒开拓了赋的题材内容，汉赋由气势恢弘走向小巧玲珑，由歌功颂德走向自我抒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巴蜀的神话传说，也让王褒带到了长安，《汉书·王褒传》说：“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上闵惜之。”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成就了王褒辞赋大家的英名，他在长安通往成都的路上结束了自己的文化与生命之旅，也让后人惋惜不已。

扬雄是学者而兼辞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上成就和地位最突出的作家。扬雄的成才与成名也是在成都与长安两大都市实现的。扬雄 40 岁以前是在成都度过的，《汉书·扬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白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这一时期，扬雄著有《汉离骚》《广骚》《蜀都赋》《成都城四隅铭》等辞赋作品，初展文学才华。他的《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府的先河。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并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直到 40 出头了，才第一次离开成都赴京师长安游学，被汉成帝的舅父王音召为门下吏。蜀人杨庄将他所作《成都城四隅铭》推荐给成帝，说有相如遗风，为黄门待诏。元延二年（前 11）正月，成帝甘泉祭天求嗣，扬雄侍从，上《甘泉赋》接着又写了《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这四赋成了扬雄辞赋的代表，也把司马相如开创的“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推向了极至。此后再也无人继续下去了。扬雄的辞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了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他沿着王褒的路子，使这种宫廷艺术走出了宫廷，咏物叙事，言志抒情，说理解难，更加散文化了。扬雄对辞赋的贡献，在于他拓宽了这种宫廷艺术的题材和表现手法。

长安与成都联袂互动，不仅造就了汉赋三大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而且掀起了长安文坛辞赋的创作高潮，使汉赋成为一代文学与文化的奇葩。正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云：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俗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

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东汉虽然定都洛阳,但西迁长安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刘秀在全国统一、天下安定之后,于建武十九年(43)“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sup>[3] (P49)</sup>于是杜笃写《论都赋》主张定都长安。其辞曰:“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厄于崤,澠,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sup>[3] (P1752)</sup>光武帝的行动和杜笃的建议,引起了朝廷内外山东权贵的忧虑,“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sup>[3] (P1753)</sup>于是,在东汉朝廷上下形成了西迁长安的“西迁派”和定都洛阳的“都洛派”,两派的观点都以京都赋的文学形式呈现出来,不仅促进了定都观念的变化,而且使京都赋成为汉赋创作的极致。尽管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两派针锋相对,但对长安与成都的互动关系,两派都一致认可。西迁派的代表人物杜笃认为,“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助”,“宾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既有蓄积,厄塞四临;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风嶽岩。关函守峽,山东道穷;置列汧陇,雍偃西戎;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sup>[3] (P1757)</sup>都洛派的代表人物班固在《两都赋》中写道:“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郊野之富,号曰近蜀”。“林麓藪泽,陂池连乎蜀、汉”。<sup>[3] (P399)</sup>两派都注重关陇与巴蜀、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互动关系,将这种互动关系看作是定都长安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中“五都之货殖”的“五都”是指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除成都都在南方,其余四大城市都在北方黄河流域。因此,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互动意义重大,辐射带动了蜀地文化的繁荣,使其“文化弥纯,道德弥臻”,“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

### 三、“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揭开了中西交通的新时代。“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秦汉时代文

明发展的显著特点。”<sup>[8] (P1068)</sup>汉代文明远距离传播和大规模吸收的基地是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长安和成都分别是北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二者通过千里蜀道连接起来,构成“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sup>[2] (P305)</sup>日月光华,照耀远方。

长安是西北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灯塔,“蹈沧海,跨昆仑”。“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骠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鬲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阌岸,获昆弥,虏数偃,驱騾驴,馭宛马,鞭馱駃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非夫大汉之盛,世藉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sup>[3] (P1755)</sup>正是由于长安文化繁盛的经济、宏阔的气度、博大的心胸、开拓的雄风,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文明辐射力和影响力,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了遥远的西方。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云:“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簠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纛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远距离地传播着大汉长安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硕果,而且大规模地吸收西域及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成就,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喜人景象。

成都是西南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灯塔,“逾昆仑,越巨海”。“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蜀之为邦;天文,并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微。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媯嫫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而宝鼎辉光于中流,离龙仁虎跃乎渊陵。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

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和》之咏,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广万里,方之九区,于斯为盛。”<sup>[6] (P330)</sup>蜀地是大西南文明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秦朝开“五尺道”,打通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联系,到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向汉武帝建议:“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到了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一条由四川盆地经云南到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蜿蜒在大西南苍苍莽莽的丛林之中,将蜀布、邛杖、盐茶、铁器、锦缎等华夏文明的瑰宝,远播海外,异域文明的成果也经此道而进,汇集到成都、长安。

汉朝为了加强成都与长安两大都市的联系,将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对接起来,也格外重视千里蜀道的开凿与维护。《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褒斜道正是沟通长安与成都的官驿大道,为了实现褒斜道水陆联运的设想,汉武帝“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sup>[1] (P199)</sup>东汉王朝继续加强秦、蜀交通,《石门颂》记载,“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sup>[9] (P21)</sup>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下诏开凿褒斜道,在褒谷口打通了世界第一个人工交通隧道——石门。到东汉顺帝时,褒斜道再次成为官驿大道。

《后汉书·孝顺帝纪》也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褒斜道的畅通,不仅确保了长安与成都的联系,而且“自南自北,四海攸通”,贯通了关中、汉中、蜀中三个“天府”,形成两汉时期中华文明在西部远距离传播和大规模吸收的基地,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论:“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光武中兴,关中残破,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而西方武力失去营卫,亦不免于转弱。”“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sup>[10] (P193)</sup>在关陇与蜀汉的“天府之国”中,“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有力地支撑起了长安与成都两座文明的灯塔,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 刘勰. 文心雕龙[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5] [英]崔瑞德, 鲁惟一. 剑桥中国秦汉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6] 常璩. 华阳国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 [7]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8] 林剑鸣. 秦汉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9] 郭鹏. 褒斜古迹辑略校注[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 [10]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责任编辑 陈正奇]

##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ang'an and Chengdu in Han Dynasty

LIANG Zhong-xiao

(Dep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College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During Han dynasty, Chang'an and Chengdu were big economic and cultural cities in China, even in the world. As the binary stars of Heaven Biao, the interacting between Chang'an and Chengdu promoted the consolidation and flourish of Han dynasty. As the sister cities of literary world about ci and fu, the interacting between Chang'an and Chengdu not only brought up some eminent people who were good at ci and fu, but also motivated the climax of writing ci and fu. As the twin civilized towers of Silk Road, the interacting between Chang'an and Chengdu projected the glories of Han civilization to distant west.

**Key words:** Han Dynasty; Chang'an; Chengdu; cultural exchanges